

# “君子待时而藏器”： 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

王春林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前，“学人入仕”的金毓黻公务与酬酢甚多，但其主要志趣却在学术。事变中，金毓黻即以读书、著书来消除拘禁生活的苦闷。伪满建立后金毓黻有意地从政界转到学术界，但也被迫参加过政治活动。其间金毓黻与伪满官员维持着学人或旧谊性质的往来，并发展了同日本学者的交往。这种关系网改善了金毓黻的处境，也有助于其学人身份的树立。随着处境的改善，金毓黻的日常生活亦从深居简出发展到相对自由，但政治环境的压抑与隐居治学的苦闷始终存在。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是其基于民族大义与现实局势的应对，其间金的“权势”与身份随之发生嬗变，金通过身份转型实现了保身、治学与脱困。

**关键词** 伪满 金毓黻 隐居治学 日本 学人身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众多东北官员身陷日伪统治区，是时南京国民政府与北平的张学良势力都无法给予他们援助，在这种情势下他们大多参与到伪满政权中。早期研究认为日本的诱逼与东北官员的投敌加速了伪满政权的建立。<sup>①</sup>其后学界进一步探讨了日本对伪满官吏的控制和利用，并尝试对这一群体做了具体分析，但对伪满官员的社会心理与日常生态鲜有涉及。<sup>②</sup>同时，伪满社会又是一个混合着中国传统和日本殖民因素的社会，伪满的中国官员、文人与日本学者之间亦延续着近代以来中日文人间的学术往来。但此时的交往则带有一定的伪满政治色彩，交往的性质亦发生变化。桑兵曾详细探讨了近代中日学者学术交往的态势以及对政治的深刻影响，并对日本留学生的种类、源流、活动等做了细致的梳理。近来学界多致力于对部分学者的个案研究。但既往研究

\* 感谢匿名专家的修改意见。此外，本文承蒙西村成雄和王希亮两先生指教，金家玲、廖晓晴、赵朗、张洪军、阎海、梁启政、赵庆云、根岸智代、蒋宝麟、李壮诸师友提供资料或线索，在此一并致谢。

① 参见姜念东等编《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148页；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81页。

② 参见张辅麟《伪满政权傀儡性再认识》，《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1931—194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车霖虹：《伪满基层政权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车霖虹：《东北沦陷初期伪满汉奸集团成因及傀儡角色》，《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学术重镇或以名家为中心的交往圈,对于伪满时期“满”日学者的交往仅略有涉及。<sup>①</sup>

时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的金毓黻身历九一八事变以及伪满前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他的个人经历颇能折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官员在伪满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既往相关研究多为对金毓黻著述的评介以及其生平的记述。<sup>②</sup>近年学界开始深入探讨金毓黻的治学路径、派别、主张以及学界交往等<sup>③</sup>,然而相关研究仍多立足于金毓黻的学术作为和学人身份。事实上金毓黻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厕身奉系,其后他与伪满和国民政府政界亦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但学界对金“学人入仕”的一面尚无专门探讨。因而笔者拟以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金毓黻为中心,展现其九一八事变前的仕宦生活,探析其在事变中的拘禁生活与内心世界,进而深入考察其在伪满时期的政治关联、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

## 一、九一八事变前金毓黻的仕宦生活

金毓黻,1887年生,字静庵,奉天辽阳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旋即返奉。他最初担任教职,其后曾在省议会兼职。自1920年起,金毓黻追随乡贤孙其昌往黑龙江、吉林任职。<sup>④</sup>金毓黻之进入政界,“以忧贫谋食之故,权安于此,非有所企于此也”。<sup>⑤</sup>因而官场职务不过是金毓黻谋生养家的依托,其主要志趣在于学术。金曾自述道:“余于近十年,治公之外,无日不读书,为之不谓不勤。”<sup>⑥</sup>公务繁忙时,他经常会抱怨无暇读书。“余以不学无识,谬入仕途。虽司笔札之役,实当古州长史之任,既时惕于贻误,复致惧于学荒。以此记论,十年以来写至六十册,而十九年一岁之中,只写二册,而苟简潦草,不堪入目,尤不同于往年”。<sup>⑦</sup>1929年3月,金毓黻由任职近十年的吉林返回奉天,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秘书。<sup>⑧</sup>其后,金毓黻逐步升迁,至1931年初曾一度担任辽宁省秘书长兼教育厅厅长,成为东北上层的要员。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在组建该校大学委员会时亦聘金为委员,并将他划入“本地有权势的官员”之列。<sup>⑨</sup>1931年5月,金毓黻获准专任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此时金毓黻身膺要职,奉系官场的酬酢成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大员常出现在这类宴会中。1930年1月18日,张学良从南京参加国民

<sup>①</sup>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五章“胡适与国际汉学界”之“关怀东亚”、第六章“东亚各国的学术交流——以中国研究为中心”和第七章“近代日本留华学生”三部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谢崇宁:《罗振玉与日本汉学界之关系考述》,《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谢崇宁:《王国维的治学与日本汉学界》,《暨南学报》2011年第4期。

<sup>②</sup> 较有代表性的有《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小组:《金毓黻学术年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87年版;孙玉良:《金毓黻先生撰写〈渤海国志长编〉的始末》,《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张志军:《金毓黻与〈辽海丛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瞿林东:《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

<sup>③</sup> 参见赵庆云《论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桑兵:《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张晓唯:《金毓黻日记所见民国学林遗事》,《书屋》2010年第2期;张晓唯:《金毓黻在五十年代》,《书屋》2011年第2期;张凯:《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sup>④</sup> 1919—1924年,孙烈臣先后主政黑龙江、吉林两省,孙其昌追随孙担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吉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孙烈臣去世后,张作相主政吉林,孙其昌仍为其重要僚属。参见胡玉海、张伟主编《奉系人物》,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8、80—82页;王成科编:《辽阳近现代人物录》,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78、148—149页。

<sup>⑤</sup>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5月7日,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441页。

<sup>⑥</sup>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29年11月1日,第2360页。

<sup>⑦</sup>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月1日,第2526页。

<sup>⑧</sup> 参见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423页。

<sup>⑨</sup> 宁恩承:《百年回首》,第211页。

党三届四中全会归来。24日“午间军政各团体公宴,张副司令于省政府席间,励以奉公守法、尚俭习勤各事”。<sup>①</sup> 是年12月4日“午后四时,假于宅宴于云章、袁洁珊两先生,并有于夫人在坐,作主人者刘海泉、刘敬舆、吴灌依及余四人”。<sup>②</sup> 频繁的公私酬酢表明,金毓黻在九一八事变前曾较深地介入到东北高层政治中。是时金毓黻与东北上层官员亦建立了较密切的私人关系。1930年9月14日,金毓黻记道:“张辅忱司令为子完姻,今日往助忙。”<sup>③</sup> 1931年8月4日,“张副司令之两公子闾珣、闾珩邀饭于霞飞馆”。<sup>④</sup> 此时“稽古读书”在奉系官场亦普遍存在,自张学良以下之官员士绅多有收藏、购书之事。时任辽宁省府秘书长的许宝衡记道:1929年9月3日,“至翟公寓晚饭,有丰城熊君罗宿及袁洁珊、金锡侯同坐,”其间观翟所藏书画。<sup>⑤</sup> 1930年1月13日,金毓黻“入夜诣崇古斋,为长官商购古币”。<sup>⑥</sup> 1931年2月14日,金“在东来阁购《越缦堂文集》四本,拟移赠王公维宙”。“王公顷正读《越缦日记》,称之甚至”。<sup>⑦</sup> 稽古读书之乐更加深了金与东北官员的私人联系。

此外,日本友人是金毓黻酬酢的一个特殊部分。因地位关系,此时与金来往者几乎皆为官员。<sup>⑧</sup> 1931年5月2—3日,金毓黻、袁金铠等人“同赴安东看樱花。南满路入江所长、木村主事亦同行,盖为招待余辈来也”。抵安东时,“中外机关首领咸来欢迎”。<sup>⑨</sup> 1931年8月24日“晚间,南满会社总裁内田康哉邀饭于大和旅馆”。<sup>⑩</sup> 九一八事变前,金毓黻与外国学者交往甚少。最近的一次是1930年底与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的几次会面,更远的一次则是1930年初与德国人福克司的会面。<sup>⑪</sup> 而金毓黻对日本学者的政治意图与治学精神亦看得很清楚。金在卞宗孟处见到《满蒙丛书总目》,他写道:“总其事者内藤虎次郎,分纂者稻叶岩吉、冈崎文夫,石山福治三君。刊行之旨趣在开发东北,而其结局适得其反,故事以中辍。即实论之,诸君子嗜古情深,乐而为此,亦非尽出于尝膺问鼎之心也。”<sup>⑫</sup>

在公务与读书之余,金毓黻还经常参加东北学社的学术活动。该学社1930年初成立,金毓黻、卞宗孟、王孝鱼为干事。“学社专为研究学问而设,期以学术之团体树自立之基础焉”。<sup>⑬</sup> 学社多以内部学者演讲为主,人数多寡不等,间或邀请来沈学者,如章士钊、高闾仙、黄炎培、陈彬和、张其昀等。此外,金毓黻还曾编辑《东北丛刊》,刊载东北史地研究之文章,并搜罗史料,计划出版《东北丛书》。<sup>⑭</sup>

①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1月24日,第2410页。“张副司令”指张学良,张时任全国陆海军副司令。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12月4日,第2520页。“于云章、袁洁珊、刘海泉、刘敬舆、吴灌依”指于冲汉、袁金铠、刘尚清、刘哲、吴恩培。

③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9月14日,第2495页。张作相字辅忱,时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8月4日,第2636页。

⑤ 许宝衡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衡日记》第4册,1929年9月3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21页。“翟公”指时任辽宁省主席的翟文选,翟1930年初卸任,臧式毅接任;“熊罗宿”为藏书家,“金锡侯”指金梁,书画家、学者。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1月13日,第2405页。“长官”指张学良。

⑦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2月14日,第2558页。王树翰字维宙,时为张学良的幕僚长。

⑧ 九一八事变前,与金毓黻来往的日本机构有南满公所、日本领事馆、满铁地方事务所、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仓组。友人有奉天公所所长(疑为古仁所丰)、仙石贡、安藤、古仁所丰、野田、入江、中岛五十治、木村锐市、永尾、内田康哉(以上为满铁职员)、荒木(军队)、鸟居龙藏(学者)。笔者据《静晤室日记》统计,时间为1929年1月—1931年9月。此外,日记中提到日人时“有姓无名”的情况很多,笔者使用时尽力做了补充,但仍有部分人名无法确认。

⑨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5月2日、3日,第2608页。

⑩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8月24日,第2644页。

⑪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12月7日、16日,1月19日,第2521—2524、2408—2409页。

⑫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8月24日,第2486页。其中内藤虎次郎号湖南,稻叶岩吉号君山。

⑬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1月1日,第2397页。

⑭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2月26日、3月23日、4月12日,第2418、2424、2429页。

吴廷燮曾称赞金毓黻道：“今中夏言东北故实者莫之或先。”<sup>①</sup>金毓黻的老师黄侃亦很欣赏他“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而不为外物所囿”。<sup>②</sup>

金毓黻属“学人入仕”，因而他对一些官场中事颇为反感，而较关注民生。“近日有人求事者，皆以严词拒之，厉色待之，以此开罪于人，所不计也。人多如鲫，万间莫庇。失业日多，革命将起。此非吾国之佳象也”。<sup>③</sup>他在致好友黄黎雍的信中表达了对学问的尊崇以及对名利的鄙夷：“今日地位之崇卑，本属一钱不值，只有淑身（向）学，自求深诣，毕生受用不尽……方今快意肆志，脑满肠肥之辈，不知读书为何事，亦不知学问之可贵，冀其对吾侪垂一青眼，复何敢望！”<sup>④</sup>他进而自然地与之划清界线，“久处宦场者，其意见往往与吾辈相左，其故何也？盖一发一敛之分耳。余谓今日凡事均应为民着想。若不此之图，而侈言某某政策，皆策士猎取功名之谈耳”。<sup>⑤</sup>

九一八事变前，“学人入仕”的金毓黻在跻身东北上层政治圈的同时，亦保持着书生本色。公务、酬酢与读书治学构成其是时生活的主要内容，而读书治学则是其志趣所在。因而，金毓黻在九一八事变以及伪满时期多以读书来消愁解闷就属情理之中了。

## 二、九一八事变初期金毓黻的拘禁生活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闻讯后臧式毅等人临危不乱，意图维持局面。次日，金“乘车入城，到厅略事安顿，即赴主席宅研究善后”。是日“夜在臧宅和衣睡卧”。20日，臧式毅、袁金铠、金毓黻等人“推议维持治安之法，谓宜用士绅资格出而维持现状”。21日“各商开市，人心可期镇定矣”。<sup>⑥</sup>然而此时之局势已不是臧式毅等人所能左右。

9月22日，臧式毅、金毓黻等官员先后被日军拘禁于日本商埠地的鲍文樾<sup>⑦</sup>宅中。关于拘禁情形，臧式毅记道：“闭锁于一室，以宪兵严重监视，内外隔绝，任何人不得会面，即家人亦不得通信，因此以后关于省内情状毫无闻知，完全失去自由三月有余。”<sup>⑧</sup>金毓黻亦记道：“余居室与臧公比邻而较小，看守宪兵以锁反扃之，若非便溺，则不得出室门一步”。“在押中间，刘厅长鸣九亦被拘来，与余居室相比，于是得以手简略通消息”。<sup>⑨</sup>因为日军有利用臧式毅等人之意，除了限制自由外，对他们生活颇为优待。金毓黻的拘禁生活可以臧式毅作为参照。臧式毅“被监禁以后，饮食供应倒很丰盛，连他抽大烟的烟具和鸦片烟都拿来了。臧式毅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饱吸鸦片，解愁消闷。衣服等物由他的秘书曹承宗送去，但不能见面”。臧过着“物质生活供应不缺”，“身体不自由，精神太苦恼”的生活。<sup>⑩</sup>金毓黻记述的“暖气”和“饮酒”两个细节亦可反映拘禁环境的“优越”。“暖气生后，室内温暖，固是一畅心事”。“羁怀久郁，忽思把盏，能共饮者只有某君，因作诗以赠

① 吴廷燮：《静晤室日记叙》，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第1页。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册，1927年11月7日，第1963页。“黻”同“黻”，“金毓黻”有时写作“金毓黻”。除引用原文外，文中一律使用“黻”。

③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2月27日，第2418页。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5月9日，第2442页。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8月7日，第2480页。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9月18日、19日、20日，第2655—2656页。“主席”指辽宁省主席臧式毅。

⑦ 鲍为东北军将领。

⑧ 《臧式毅笔供》（195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0页。

⑨ 《沈阳蒙难记》（1937年2月），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56—2657页。刘鸣九时任实业厅厅长。

⑩ 王子衡：《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84、95页。

之”。<sup>①</sup>此外,金毓黻还有读书、写日记的自由,日人曾向其求字和诗。<sup>②</sup>

然而臧式毅、金毓黻在日人筹建新政权的计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奉天<sup>③</sup>省府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希望金毓黻出任教育厅厅长或省府秘书长。<sup>④</sup>在金毓黻被拘禁期间,《盛京时报》关于他的报道甚多。9月25日曾登出金毓黻“连日主张全部学校开课以重教育”,目下正与张学良等磋商办法的消息。<sup>⑤</sup>此消息与金事变初期“稳定局势”的想法相符。但此时金已被拘禁,因此该报道当依据拘禁前的态势而作。其后的报道渐渐有些乖谬。10月1日,《盛京时报》报道金毓黻“面谕各中小校长,通知全体学生,一律于十月八日,照常上课,以免荒误学业”。<sup>⑥</sup>但事实上金毓黻此时正处在拘禁初期的焦躁中。他认为:“每日多读书,多写日记,即系自遣之法。”<sup>⑦</sup>其后,金毓黻即开始每日读书、写字打发时间。其间金毓黻曾“戏作一文,以当解嘲”。此文实为其“拘禁一读书”生活的自述,他向外人展示了宠辱不惊、安之若素的形象,但也流露了其母亲的惦念。<sup>⑧</sup>因此,此前的报道或为日军假金氏名义所发,意在恢复局面。10月8日,金毓黻就在日记中隐晦地记述了日人的劝诱。“西谷君写似诗似词之句示余,余依其意成《浣溪沙》一词云:‘西风恻恻送轻寒,一片花飞向远天,欲将消息问秋残。昔为珠履三千客,今阻金城百二关,不须重话旧因缘。’”<sup>⑨</sup>该词上片表明金虽身在禁中,却很关心外面的时局。下片通过对比反映了今昔处境差别之大,末句似向日人表示其无意借助“因缘”改变现状的决绝态度。其后,报纸上仍有关于教育厅厅长人选的议论。11月底,地方维持委员会“决定于日内将教育厅恢复,主办学务,厅长一席委员张成箕未久兼任,该会已另选人充任”。<sup>⑩</sup>不久,又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报道:省政府“决定将该厅恢复,以张成箕为厅长”。<sup>⑪</sup>

这期间,金毓黻要打发苦闷且遥遥无期的拘禁生活,又担忧时局,惦念家人。但他又不愿屈从于日人,因而不得不时时调解其因拘禁而发生的心绪波动。金毓黻起初试图以读书解闷,因而读书较杂。然而可读之书不多,他自解道:“书多亦害事,一书未终,又阅他书,博涉无定,必鲜所得。”<sup>⑫</sup>金又总结了一套调适身心的办法:“习劳则使吾身疲,治学则使吾神怡。身疲则心不外惊,神怡则随遇而安。”<sup>⑬</sup>道理虽明白,然而被拘禁的苦闷却挥之不去。他很快就对读书产生厌烦:“每日枯坐读书,虽有手不释卷之益,然毫无变化,久之亦感寡味。”<sup>⑭</sup>稍后,金又担忧自己读《徐霞客游记》过快,“惟恐其尽,手边书本不多,此而读尽,更有何书可读乎!”<sup>⑮</sup>一连串看似矛盾的文字表明,金毓黻对遭到拘禁而被迫读书的生活感到极不适应。其后金毓黻又重拾日前的调适身心之法,“近日心

①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1月4日,第2712页。

②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23日,12月8日,第2692、2767页。

③ 九一八事变后,日人改辽宁省为奉天省,隐然有否定国民政府施政之意。因“奉天”省名通行于1907—1929年间的清末和北洋时期,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改奉天省为辽宁省。

④ 《沈阳蒙难记》(1937年2月),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57页。

⑤ 《金教育厅长主张全部学校开课》,《盛京时报》,1931年9月25日,第4版。

⑥ 《教育厅长面谕各校长:通知全体学生十月八日上课》,《盛京时报》,1931年10月1日,第4版。

⑦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9月23日、24日、25日,第2661—2662页。

⑧ 参见《尺蠖生传》(1931年10月7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74—2675页。

⑨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8日,第2675页。

⑩ 《教育厅日内恢复》,《盛京时报》,1931年11月21日,第4版。事变后,奉天政府机关瘫痪。9月24日袁金铠、于冲汉等组织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26日,该会改称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成为日军控制辽宁的傀儡机构。张成箕时任该会委员。

⑪ 《恢复教育厅张成箕任厅长》,《盛京时报》,1931年12月1日,第4版。

⑫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9日,第2676页。

⑬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10日,第2677页。

⑭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10日,第2678页。

⑮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18日,第2686页。

劳而身闲,心多思虑故劳,身无所用故闲”。“宜使身劳而心闲”。<sup>①</sup>金之分析看来不错,但是难以行得通。而后他进一步剖白了其心病所在:“常作不可期之念,有急脱羈继之望,此真愚而无当者也。”他并且训勉自己应“乐天知命,淡焉若望,心怡神恬,行所无事”。<sup>②</sup>然而此种说教作用有限。最后金毓黻终于触及问题的根源:“烦闷之生,由于环境不良,每触环境,烦闷即生。”<sup>③</sup>事实上,金的烦闷实为境遇所致,但因无法改变,他只能在祛闷、涵养上下功夫了。然而如此排遣,似乎仅能治标而不治本。不久金毓黻就坦承心烦难制,“时间虽多,读书甚少,即以心神烦躁,制伏不住故也”。<sup>④</sup>

无奈之下,金毓黻不得不继续埋头读书来消愁解闷。10月29日,他“自家中取来《唐书》、《五代史》、《续通鉴》诸书,足敷二十日阅览之用,心神为之一畅”。<sup>⑤</sup>这些书暂时解决了他的书少之苦,数日后他萌发了撰写《渤海国志长编》的想法。金毓黻对著书已有相当的积累,虽然困难很多,他还是有志于完成此书。<sup>⑥</sup>其后他开始有目的地读书、准备。“余近发愿撰《渤海国志长编》,誓于三阅月内成”。计总略、世纪、列卿等十目,“约七、八万言可毕,期以三月之工,尚非难事”。<sup>⑦</sup>11月18日,金毓黻开始撰写。于拘禁中著书,其艰难可想而知。“此志之纪、表、传,皆易著笔,惟考最难,以非数千百语可了故耳。参考书缺《三国史记》、《渤海史考》,再《全唐文》及《全唐诗》,恐不无材料可寻。惟一时不易检齐,俟异日补辑之”。而囿囿中的写作进展亦令其备感快慰。<sup>⑧</sup>半月后,他总结了著书进度与困难:“迄今只十六日,已草成三万余言,一日约二千余言,加以搜集参考,颇耗日力,亦不可不谓之速矣。现计已得其半,惟《地理考》最难作,须一星期始能杀青,他考亦较列传难作,大约今年岁杪(杪)始能竣功,盖创始者之难也。”尤为难得的是,他在此时仍抱着严谨的治学态度。“草成之后尚须覆校原书,前后舛紊,亦须一一修正。仓卒(猝)观成,疑误必多,是又须慎于将(来)耳”。<sup>⑨</sup>完成《渤海地理考》后,他又总结道:“五日之中,写二万言,每日约四千言,搦翰之勤,无过于此矣。今日告一段落,颇有踴躍满志之乐。”<sup>⑩</sup>可见,是时金毓黻撰写的效率颇高,自己也很满意。他甚至萌生了新的治学计划:“近日感于无事,忽发愿重修《宋史》,此邵与桐、章实斋脚蹶半生而不能为者。”<sup>⑪</sup>

金毓黻开始著书后,其情绪却陷入持续的低落状态。“近一、二日内,心情不如往日之佳”。<sup>⑫</sup>其后金心境愈劣,“未能安心撰著”。并且“食不下咽,眠亦不佳”。11月24日,金的心绪极坏,“处境已达极蹙,几欲自裁。于无可如何中占一卦以验之”。<sup>⑬</sup>他在这种心境下撰写了《〈渤海国志长编〉序》。次日重读该序后,金悲愤地写道:“吾国古训,仕学向不分途。余以学人而入仕,未为违古之则,乃竟以入仕之故,遭西伯、史公之遭,则为学诚不足以淑身耶!吾闻今世各邦,礼待学人甚优,俾其安心撰著,余何独不邀此遇。”<sup>⑭</sup>金所重者“学”,日人所重者“仕”,这番仕学不分的道理日人自

①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23日,第2692页。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24日,第2693页。

③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27日,第2694页。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28日,第2696页。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29日,第2697页。

⑥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1月4日,第2709页。

⑦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1月12日,第2733页。

⑧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1月28日,第2757—2758页。

⑨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2月4日,第2765页。

⑩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2月10日,第2768—2769页。

⑪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2月12日,第2771页。

⑫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1月20日,第2752页。

⑬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1月22日、24日,第2754页。

⑭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1月25日,第2756—2757页。

然不会理会。其后金毓黻每日用心撰述,然而纷扰依旧。其间或不乏劝说其出仕者。“每日日间最难遣,至夜间则心开矣”。<sup>①</sup>“昼间颇不能沉心著撰,以心有杂念,目有杂观也。入夜则否”。<sup>②</sup>至拘禁后期,金毓黻仍尽力安抚自己,但也有些心力交瘁了。“每日多读多作,心有所专寄,则不生他念,此实摄神持心之一法。余用此已有效,惟不免过于疲劳耳”。<sup>③</sup>

拘禁期间,金毓黻作诗或写日记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直接表达烦躁、郁闷的情绪,另一种是尽力表现出积极、豁达的态度。两种念头此起彼伏,他的情绪亦随之波动。金毓黻日常的内心世界可以11月15日的日记为参照。是日,金作了风格不同的三首诗,其情绪显然经历了较大的起伏。其两首感事诗风格阴郁,悲愤、苦闷之情充满字里行间。大约晚间心境平复后,金又作了《四有诗》,他在诗中展现了对“居有室,食有鱼,读有书,浴有汤”生活的满足感。<sup>④</sup>此诗自然为自慰之作,然而金每每能以积极心态应对心绪起伏,其间反映了他安抚自己、对抗拘禁的气节。

这期间家人的关怀是对金毓黻最大的慰藉,但也时常会影响他的情绪。“正独居无俚,长衡儿来函,言新归自东瀛,送衣二袭、《徐霞客游记》四册来,得此心为之开”。<sup>⑤</sup>“此间书不敷读,托人至家取之,并所用衣物,久久不至,心颇闷闷,恐有障碍,否则早到矣”。<sup>⑥</sup>而最令金毓黻惦念的则是其母亲。“余母今年七十有六,真所谓日暮西山,风烛残年,而迄今不知余之确息,家人亦不以告。余日夜念之”。<sup>⑦</sup>12月15日,金记道:“后日为母亲七十有六生辰,不能归家奉觞,一尽莱彩之欢,思之黯然。”17日,金“欲行遥拜之礼,旋以非典而止”。<sup>⑧</sup>

12月13日,臧式毅在同意与日人合作后获释。在臧式毅的照拂下,金毓黻于20日获释。金毓黻以读书、写日记等方式熬过了三个月的拘禁生活。这种被迫的“拘禁—读书”生活打断了金毓黻多年的仕宦生涯,其获释后与日“满”政学两界的关系及其日常生活都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 三、伪满时期金毓黻的政治关联

臧式毅就任伪满奉天省省长后,金毓黻被日人内定为教育厅厅长。<sup>⑨</sup>但是因金毓黻无意续任,教育厅恢复又迁延日久,省政府不得不先设立了一个过渡机构“教育事务筹备处”。<sup>⑩</sup>直至1932年4月,教育厅方恢复成立,韦焕章任厅长。<sup>⑪</sup>日人希望金毓黻担任伪满官员,金坚决抵制。经臧式毅斡旋,金被派为省政府参议。“臧公告余,与金井折冲结果,以君为省府参议,不必问事,且谓此系日人所硬派,不问君之受不受也。余曰硬派由他,不作由我”。不久日人又派金为参事官,“金井又窜余名于省署参事之内,余虽托臧公力拒,渠竟置之不理”。<sup>⑫</sup>事实上参与参事官为同一职务,只

①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1月28日,第2758页。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2月5日,第2765页。

③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2月9日,第2768页。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1月15日,第2740—2742页。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8日,第2675页。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0月15日,第2682页。

⑦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2月2日,第2762页。

⑧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1年12月15日、17日,第2774—2775页。

⑨ 参见《教厅筹备中厅长人选》,《盛京时报》,1931年12月26日,第4版。此后金毓黻及相关人物担任的都是伪职,为了行文方便,不再一一注明。

⑩ 参见《教育筹备处正式成立》,《盛京时报》,1932年1月24日,第2版。

⑪ 参见《教育处改厅》,《盛京时报》,1932年4月19日,第4版。韦焕章原为金毓黻下属。

⑫ 《沈阳蒙难记》(1937年2月),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57页。“金井”指金井章次。

是名称更改而已。奉天省公署“参议改为参事官,金毓绂、穆元植、王滋栋等三名”。<sup>①</sup> 时任省署顾问的阮振铎记述了三人的分工:金毓绂“担当文化教育,帮同韦焕章成立伪教育厅;穆元植担当行政,帮助我阅公文,王兹栋(日寇陆军士官学校出身,和臧式毅同学)担当军事”。<sup>②</sup> 奉天省文化机关在事变后多划归教育厅管辖。<sup>③</sup> 1932年5月15日,关东军参谋部森纠少佐主持协议设立图书馆的具体问题。<sup>④</sup> 6月10日,金毓绂被任为奉天图书馆副馆长,袁金铠为馆长。日人的安排显有羁縻之意,森纠来“问余何以不出任事?余以无才作事,惟喜读书答之。渠乃言已将沈阳公私收藏之图书聚集于大南门内张学良旧邸,谓之图书馆,愿余为之整理。是盖对余有防范之意,借此以困羈之也。从此遂移置于张邸,派军曹西田实在侧监视之”。<sup>⑤</sup> 1934年夏,金毓绂兼任通志馆总纂。“余知坐守图书馆与出走有碍,乃托臧公向日军部商谓《奉天通志》(应名《辽宁通志》——整理者注)未成,非金某执笔不可,命余专主其事,竟得谐愿。余遂自张邸移住于通志馆,从此亦无日人在侧监视,而余稍得自由矣”。<sup>⑥</sup> 以上是伪满时期金“担任”的职务。<sup>⑦</sup>

伪满各界在提及金毓绂时或称参事官,或称副馆长。“奉天省政府参事官是很重要的要职。因为省长臧式毅兼内务大臣经常到新京,省长大印由参事官掌管,即省长不在时的代理者”。“另外,由于作为馆长的袁金铠当时出任满洲国的参议,长期住在新京,作为国立图书馆的副馆长的金氏成为事实的馆长”。<sup>⑧</sup> 因此金在一般人眼中当仍为高官,惟有交好者方知其“求退”之意。

但金毓绂身在日伪政权下,欲完全与政治绝缘似无可能。因为臧式毅、金毓绂在获释后仍受到日人的监视,毫无行动自由。<sup>⑨</sup> 臧式毅“由日本军释放时起,即派有宪兵军曹横山政雄者长期跟随监视,美其名曰保护。该军曹出则同车,入则驻于宅内,公厅私宅任便出入,凡有来客访问须先告知该军曹,得其同意后方能传达接见。每次会客则进入客厅坐听,监视与客人之谈话”。直到1934年12月臧往长春专任民政部大臣后,该军曹始行撤去。<sup>⑩</sup> 金毓绂亦回忆道:日本宪兵“于余则稍放宽,准余归寓住宿,但三、四日内必来看视一次。至余外出之时,常有特务尾随于后,因之余不敢外出,惟在寓读书自遣,《渤海国志长编》之定稿亦杀青于是时”。<sup>⑪</sup> 在这种情势下,金毓绂有时不得不“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此点是金深以为耻而于日记中鲜有记录的。

① 《省署参事官三名秘书共八名》,《盛京时报》,1932年5月24日,第4版。4月18日奉天省城各机关领袖发表时,“谥议金毓绂”列名于高官之中(参见《省署以下各机关领袖已发表》,《盛京时报》,1932年4月18日,第2版)。但“谥议”为清末民初的官职,与前文之“参议”、“参事官”职责相近,彼时处于张学良和伪满政权交替之际,“参议”、“谥议”似被混淆。参见佟佳江编《民国职官年表外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② 《阮振铎的笔供》(1954年7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第132页。

③ 参见《教处负责保管文化机关》,《盛京时报》,1932年3月5日,第4版。

④ 《馆务要录》,《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1934年第1期,第1页。

⑤ 《沈阳蒙难记》(1937年2月),金毓绂:《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57页。西田实在图书馆的名义是负责事务部,掌管庶务、会计事宜。参见《馆务要录》,《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1934年第1期,第2页。

⑥ 《沈阳蒙难记》(1937年2月),金毓绂:《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58页。

⑦ 在金毓绂隐居治学后,日人甚至还有利用其学人身份的意图。日人“欲借助他的力量,以遂其阴谋征服之诡计。特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赠以文学博士学位,并设立伪满研究院,请金先生出主院务。金先生严词拒绝”。(孟子微:《记金毓绂先生》,香港《大公报》,1962年9月14日,第10版)金毓绂1962年8月3日在北京逝世,该文月余后即刊出,因而金毓绂的儿媳于仅认为作者应为辽金史研究者或金先生的学生。参见于仅《关于金毓绂先生逃脱伪满的回忆》(手稿),1985年5月,金家珍藏,第1—2页。金家玲为金毓绂长子金长佑的女儿。原文无标题,题目为笔者加。

⑧ 岛田好:《评〈渤海国志长编〉》(《书香》第62期,1934年),梁启政、张楠主编:《金毓绂研究文集》,吉林教育音像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1932年3月,伪满建都长春,改称“新京”。

⑨ 王希亮曾深入探讨日本对伪满高官的操纵、利用和控制及其对伪满社会森严的警察特务统治。参见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1931—1945)》,第45—51、232—279页。

⑩ 参见《臧式毅笔供》(195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第71、77页。

⑪ 《沈阳蒙难记》(1937年2月),金毓绂:《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57页。

1932年2月16日,伪满建国会议召开。日本学者提及了金参与会议的细节:“从2月17日中午开始,为起草新国家独立宣言,推选奉天省政府参议金毓黻,吉林省教育厅长荣孟枚,东省特别区政务处长宋林三人为起草委员。”18日下午,发表“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sup>①</sup> 臧式毅证实了金毓黻被挟制参与建国会议的事实:土肥原贤二宣布“建国”后,请各省省长回省准备,留下代表继续讨论国号、国都、国旗和国体问题。“所有各项问题均系由该大佐提案,所表决者亦是他的原案。再则每次开会席上均有日本军部参谋和知中佐及法律专家松木侠在场监视。在此种情形之下,名为开会,佯为征求意见,实则一方面宣布办法,我方又无具体意见,只俯首听受,任人拨弄,开会则徒具形式而已。时奉天省长代表为实业厅长冯涵清、高等检查厅长李槃、省署参议金毓黻”。<sup>②</sup> 22日,郑孝胥亦记道:“至行政委员会旁听,是日议国体”,“奉天代表为金毓黻、冯涵清、李槃”。是日金还前往拜访了郑。<sup>③</sup> 郑记述较详,金毓黻则讳言其事。金仅在20、21两日有“忙于酬酢”的记录,23日方写道:“前昨两日晤郑苏戡、罗叔言二老人。郑公年七十三,精神充满,如五十许人。”<sup>④</sup>此事于郑孝胥、金毓黻两人意味不同,郑为伪满政权的积极筹建者,金为欲远离政治却又被迫参与的前东北官员,因而详略差别甚大。

长春为伪满首都,金毓黻每次前往似多有政治“任务”。1932年3月2日,“夜九时,随臧公发沈垣北上”。3日“朝七时抵长春”,“夜十时南返”。<sup>⑤</sup> 9日“午后,应臧公召赴长春”,12日“夜十时发长春”。<sup>⑥</sup> 此时为伪满政权筹建之时,金毓黻两次随臧式毅前往当不无关联。然而金日记中多记录会友、应酬等,返家时则从事撰述。臧为筹建伪满政权的“巨头”之一,金当为被迫前往装点门面、壮大声势之用。类似的记述在是年9月初亦曾出现。<sup>⑦</sup> 此时为日本与伪满签订《日满议定书》之前,金毓黻身在政治中心却仍仅记录了其与友人的酬酢。究其原因,金当为违心参与而讳言其事;另一方面,与旧友相聚的文字较之谈论政治显然更为“安全”。彼时溥仪、臧式毅等人为伪满政权的傀儡,金毓黻在这种傀儡戏中亦经常随臧式毅出场跑龙套,在一定程度上亦充当了傀儡。

此外,金毓黻还曾参与过一些伪满官方的祭祀活动,但多无直接记录。1934年3月22日,刚刚登基的伪满皇帝溥仪派前清恭亲王溥伟到奉天祭祀太庙以及永、福、昭三陵。23—28日,溥伟在奉天省日“满”各机关协助下先后祭拜上述各地。此行显系官方活动,但在金毓黻的记述中形同游玩。“久思作兴京之游,寻清初建都及陵寝遗迹,今适有机会,故决计一往”。“此次随祭陵者而来,同行有于、韦二公”。闻“嗣恭王溥伟颇工诗,近与相晤,盖一贵介公子而有才华者,颇熟于爱新氏家世掌故”。<sup>⑧</sup> 可见,金毓黻不仅随同祭陵,且曾与溥伟晤面,并为其风采所折服。此次祭祀的政治意味较淡,金之参与似乎既有跑龙套性质,又兼有考察意味。而是年10月19日,溥仪来奉拜谒太庙与祖陵仪式的官方意味十足,金毓黻在受到赐见的伪满官员中列名第6位,高居5位厅长之

①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满洲国史·总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1990年版,第214—215页。

② 《臧式毅笔供》(195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第73—74页。

③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5册,1932年2月22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67页。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2月20日、21日、23日,第2799—2800页。郑孝胥字苏戡,罗振玉字叔言、叔蕴。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3月2日、3日,第2801页。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3月9日、12日,第2803页。

⑦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9月7日、8日、9日,第2861—2862页。

⑧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3月23日、24日、29日,第3271、3275页。“于、韦二公”当指于芷山、韦焕章二人,均为陪同溥伟的地方官员。

后。<sup>①</sup>但金毓黻在日记中对这次祭祀只字未提,此种出场显然仍为跑龙套性质。

类似的情形在一些文教会议或出访中亦存在。1933年10月15—22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等人访问伪满,其间与郑孝胥、罗振玉等伪满高官成立日满文化委员会,并开会数日。郑孝胥几乎全程参与了接待和会议。<sup>②</sup>而金毓黻却仅在日记中记录了其陪同内藤湖南以及与之谈论学术的内容。<sup>③</sup>但金毓黻主持的奉天图书馆馆刊则证实了他参与会议的事实:16日“金副馆长为出席日满文化委员会公出文教部,二十日归任”。<sup>④</sup>金毓黻参与了成立会,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委员。<sup>⑤</sup>但金自始至终都讳言其事,或则并非本意。1935年1月,民政部大臣臧式毅率民政部与奉天省官员访日,金毓黻亦随行。行程中包括拜访日本天皇以下诸官署的内容。<sup>⑥</sup>然而金在日记中仍然多记录访问图书馆等文化机关以及名胜,而无政治会晤<sup>⑦</sup>,金当仍为被迫前往而讳言其事。

伪满时期,金毓黻有意地远离政界而转向学术界。这显然是时势所迫,意在保身与明志。1932年4月22日,金毓黻写道:“自今日起,谢去一切酬酢,在家不见一客,对人不轻发一言,以此为持身涉世之方。”<sup>⑧</sup>1933年8月17日,已成为金毓黻友人的森纠行将归国,行前他建议金毓黻在学术界谋保身之道:“方今局势未定,先生以不居政界为当,居而有为被嫉,居而无为被蔑;应求明哲保身之道于学术界。”<sup>⑨</sup>这番话令金生出知己之感。从金毓黻的反应看,森纠的建议正契合他的心思。尽管其间仍有被迫参与政治之情事,但金已逐渐淡出官场。金毓黻的参与对日人和金而言颇有“各取所需”的意味。日人希望以此营造伪满政治的民意基础,而金毓黻的轻描淡写与专注学术,既表明参与出于胁迫,又折射了他的志趣所在。

#### 四、伪满时期金毓黻的社会交往

淡出官场后,金毓黻与伪满政学两界的联系仍然很密切。但金毓黻仅以学人或旧谊身份同他们交往,因而其政界人脉仅略有发展,而学界人脉则扩展较大。后辈因而称赞其“去官益觉士名高”。<sup>⑩</sup>

##### (一) 遗老与旧谊

伪满政权中的前清遗老多为旧式学人,在论学稽古方面与金毓黻志趣相投。奉系及张学良时期的官员大多留任伪满,金与他们既有旧谊,又多有文人间的酬酢。因而金毓黻与伪满各阶层官员

① 参见《满日要人荣荣赐谒》,《盛京时报》,1934年10月19日,第1版。

② 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5册,1933年10月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第2488—2490页。

③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10月15日、16日、17日、18日、24日,第3164—3167、3170—3172页。金19日仅记录“阅《翰苑新书》。”几个字,20日自长春前往吉林,因此19日或仍陪同内藤等人。

④ 《馆务要录》,《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1934年第1期,第6页。

⑤ 该会为日人水野梅晓等人推动建立。是年9月3日,郑孝胥与水野、宝熙、罗振玉、袁金铠、臧式毅等人成立“中央文化委员会”之发起会。该会拟举郑为会长,宝为副会长,罗为博物馆馆长,袁为图书馆馆长。发起会成员多与金毓黻熟稔,而金又主持奉天图书馆,所以金与会及成为委员似为情理之中。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5册,1933年7月21日,8月2日、31日,9月1日、2日、3日、7日,10月13日,第2471、2472、2474、2479、2480、2481、2482、2488页。该会应即后文的“满日文化协会”。

⑥ 参见《臧大臣一行抵连》,《盛京时报》,1935年1月8日,第4版。

⑦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1月9日、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15日、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27日,第3511—3514页。

⑧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4月22日,第2812页。

⑨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8月17日,第3127页。

⑩ 竟方:《铭木诗呈静庵世丈》(1936年1月22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768页。

颇能“融洽”相处。但因政治关系，金的接触与应酬大多属于私交性质。

在遗老方面，金毓黻多以后辈学人的身份来往，而不涉政治。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本身即为诗人、书法家。金对两人交往的记述较为简略，郑孝胥则有详细记录。1933年3月30日，“金毓黻来，新举为国立图书馆副馆长，求书图书馆扁及‘千华山馆’扁，乞《海藏楼诗》”。<sup>①</sup>同年9月17日，金“遗所著《渤海国志长编要删》，本于唐元素所撰《渤海国志》而增广之；且言将集《辽海丛书》，已搜辑数十种”。<sup>②</sup>1935年12月15日，金毓黻记道：“夜起庵主为余作篆、隶书小幅，由叶浦老转来，因其近喜习此二体也。”<sup>③</sup>从两人的记述看，二人似纯为文人往来。曾任监察院院长的罗振玉亦为学界前辈。金毓黻曾到旅顺拜访罗振玉父子，并参观其藏书。罗振玉回拜时谈及《四库全书》与《清实录》刊印事。<sup>④</sup>其后罗氏父子与金多有学术往来。金赞颂罗道：“老辈心细如发，读书得间，真后生所万不敢望。”<sup>⑤</sup>在长春时，金毓黻曾“欲往拜罗雪堂，以居于枢府中，故不之往”。<sup>⑥</sup>这一细节暗示了金在与罗交往中似有意排除政治因素。遗老陈宝琛德高望重，金毓黻对其执晚辈礼甚恭。1932年11月20日，金同好友黄黎雍往长春谒见陈宝琛，其后金毓黻收到袁金铠转来陈宝琛之诗及条幅，陈对金与黄黎雍赞誉有加。<sup>⑦</sup>在陈宝琛返回天津时，金又至车站迎候，“仅立谈数分钟，车开别去”。<sup>⑧</sup>陈宝琛对金毓黻颇为期许，曾致函金道：“知撰集《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卒业在即，尤亟快睹。旧邦文教，惟赖二三贤达倡导而振兴之，庶不为异说所移夺。”<sup>⑨</sup>

在原东北高官方面，曾任伪满奉天省省长等职的臧式毅与金毓黻公私交谊匪浅，对金关照甚多，曾任黑龙江省省长等职的孙其昌对金亦甚照顾。彼时金处嫌疑地，动辄得咎。“孙公告余云，此时不可轻作诗”。<sup>⑩</sup>金毓黻对孙、臧二人的知遇亦甚为感激：“长春之孙公，沈阳之臧公，弟皆追随甚久，肥瘠相关，患难与共，且屡屡为弟道地。”<sup>⑪</sup>“余橐笔外出，原为饥驱。前依孙公，不为不久，而衣食之惠，衔感难忘。及依臧公，其情亦然，重以中经忧患，相依为命，二年以来，辄以冷暖枯菀相关”。<sup>⑫</sup>曾任参议府参议等职的袁金铠为奉天著名士绅，与金毓黻交谊甚深。金曾在诗中写道：“洁丈吾所师，况居乡党久。”<sup>⑬</sup>金对袁之为人处事甚为推崇，“余每与梁钧甫晤面，必盛赞洁丈之器量，尤佩其能与时消息”，“孟子所谓不动心者，洁丈其庶几矣”。<sup>⑭</sup>金毓黻为袁校订文稿，“洁丈嘱余校订谓宜痛删，有不处即加改正”。“余承其意，多所删订，非此无以报公，亦非公不能受此也”。袁金铠在日记中则称赞金“头脑清晰而绝无痰气”。<sup>⑮</sup>

在旧时同僚方面，金毓黻则以旧谊或学人身份相酬酢，更无关政治。好友穆元植原亦任职东

①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5册，1933年3月30日，第2451页。“千华山馆”为金毓黻书斋名；郑孝胥号海藏，《海藏楼诗》为其诗集，后文的“夜起庵”为其书斋名。

②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5册，1933年9月17日，第2484页。

③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12月15日，第3751页。

④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11月30日，12月1日，第2908—2909页。

⑤ 《复罗雪堂先生笺》（1933年1月8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953页。罗振玉号雪堂。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11月20日，第2896页。

⑦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11月20日、29日，第2895—2896、2907页。

⑧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1月29日，第3235页。

⑨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1月21日，第3232页。

⑩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3月3日，第3001页。

⑪ 《复刘馨岩函》（1933年1月7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951页。

⑫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11月26日，第3490页。

⑬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1月6日，第2949页。

⑭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3月12日，第3011页。

⑮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7月7日，1935年9月26日，第3378、3675页。

北,事变后转任参事官。金很欣赏穆的人品学问,两人于问学上“时有商量之雅,一言一契,分寸之得,则誉不容口”。<sup>①</sup>友人闾铎任奉天铁路局局长,颇有名士风范。金毓黻对其有中肯的剖析与评价:“闾君霍初喜浏览书史,好刻书,喜近学人,诚晚近不可多得之人。然有一短,即好惊声气,不于书卷中细细求之。”<sup>②</sup>闾去世后,金毓黻主持的奉天图书馆馆刊哀悼称:“本馆自奉命筹备以来诸凡进行规划,故闾先生霍初赞助实多,临终遗嘱复将所藏图书尽数捐赠本馆,仁风义举,薄海同钦。”<sup>③</sup>日“满”政界、文化界人士亦同声哀悼。<sup>④</sup>友人阎传绂曾任奉天市市长等职,金尤称赞其作诗与结社之能力。“纫韜之诗,喜为近体,晓畅似元白,典丽似温李”。“自移宦沈阳,盖不懈于倡导。既结鸥波诗社而为之主,一岁之中,频相赓和,余亦得追随其后,收切磋观摩之益”。<sup>⑤</sup>

除诗文酬酢外,在婚丧嫁娶这些政治痕迹淡薄的活动中,金毓黻与官员们常以友人身份来往。1934年2月6日,“同绍伯赴辽阳唁孙公丁内艰”。<sup>⑥</sup>1935年8月10日,“臧公为子完娶,前往帮忙,逾午事毕”。<sup>⑦</sup>在臧式毅儿子的婚礼上,前往致贺的日“满”要人甚多,其中多为金毓黻的旧日同僚。<sup>⑧</sup>这些活动维系着金毓黻与旧谊的联系,亦缓解了其隐居不仕的尴尬处境。

此外,金毓黻与伪满官员的交往中亦不可避免地涉及时局或人事,但他仍多以学人或友人身份出现。1932年9月1日,金“为省垣治安事询之当局,谓有把握”。<sup>⑨</sup>此当局当指臧式毅或负责沈阳治安者。1934年5月9日,郑孝胥亦曾记道:“金毓黻来,为吴继镇求事。”<sup>⑩</sup>吴为吴廷燮之子,金毓黻与吴廷燮多有学术往来,后来曾拜其为师。因而金毓黻为吴求职属情理之中,但他竟然向郑孝胥求职。可见,金毓黻虽未出仕,但在伪满官场仍有丰富的人脉,因而他的潜在影响不容低估。金毓黻还曾向长春旧谊打听官方对其友人之态度。1935年6月25日,“至春城,晤王荆山、孙笙午、田新吾、杨世祯。为秩青事多方访讯,无不详之耗,心稍慰”。<sup>⑪</sup>

金毓黻的“高官”背景及其与伪满官员的交往对其治学助益不小。金毓黻在考察中每到一地,必有当地官员出而接待,或陪同,或宴请,或迎来送往。<sup>⑫</sup>在报界眼中,金的考察俨然是一种官方活动。1934年10月的《盛京时报》报道称:“省公署参事官金毓绂日前莅县境石山站调查”,“兹于月之十七日由义返锦,复调查古迹”。<sup>⑬</sup>在史料搜集方面友人或旧谊亦常向金毓黻提供帮助。1934年1月8日,“午后诣闾宅,借观镜泊湖调查书及照片,承赠照片一份,益我非浅”。<sup>⑭</sup>同年9月8日,金又记道:“近日得见二墓志,皆明人也。”“一为翁君问卿所得,出自锦县;一为孙君笙午所得,出自辽阳。”<sup>⑮</sup>在书籍刊印上金毓黻亦得到旧谊的支持。他先后与韦焕章、袁金铠、熙洽等人商议刊

① 《穆允滋先生传》(1933年5月18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3056—3057页。穆元植,字允滋。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5月10日,第3051页。闾铎,字霍初。

③ 《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编辑例言》,《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1934年第1期,第1页。

④ 《闾局长哀荣》,《盛京时报》,1934年4月18日,第4版。

⑤ 《〈稻农诗草〉序》(1935年11月10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729页。阎传绂,字纫韜。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2月6日,第3237页。

⑦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8月10日,第3631页。

⑧ 参见《臧吉两家联姻:华烛典礼盛极一时》,《盛京时报》,1935年8月11日,第4版。

⑨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9月1日,第2860页。

⑩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5册,1934年5月9日,第2524页。

⑪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6月25日,第3610页。“秩青”应为杨钟曦,字子晴、芷晴等,曾任伪满奉天博物馆馆长,参与《奉天通志》的编纂。参见王成科编《辽阳近现代人物录》,第105页。

⑫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11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第3180—3199页;《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9月7日、14日、15日、16日、17日,第3646、3656—3658页。

⑬ 《金参事官调查古迹》,《盛京时报》,1934年10月30日,第9版。

⑭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4年1月8日,第2952页。

⑮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9月8日,第3415页。

刻《辽海丛书》事,并获得支持。<sup>①</sup> 该书“出资者五人:曰沈阳臧氏、长白熙氏、辽阳袁氏、吴氏、孙氏”。<sup>②</sup>

## (二) 日本学者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来东北侨居的人数大幅增加。<sup>③</sup> 金毓黻与日本各界的交往亦空前密切,其中大部分为来访学者或日本文化机构,形成了一个以金为中心的学术圈。这个学术圈包括在伪满、朝鲜与日本的日籍学者以及图书馆、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详见表1)。

表1 伪满时期与金毓黻交往的日本人及机构

类别	姓名
满铁官员	粟野、木村锐市、黑柳一晴、饭田。
宪兵	横田、森胁、西田实。
关东军军官	森纠。
学者	羽田亨、松崎鹤雄、植田武雄、植野、稻叶君山、和田清、村田、滨田耕作、池内宏、鸟山喜一、秋贞实造、外山军治、小林胖生、山下泰藏、赤松智城、水野梅晓、藤塚邻、鸳渊一、泷川资言(龟太郎)、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桥川时雄、秋叶隆、竹岛卓一、斋藤、渡边三三、原田淑人、关野贞、园田一龟、鸟居龙藏、长泽规矩也、三上次男、岛山、岛村义太郎、狩野直喜、黑田、吉田。
诗人	国分高胤、长尾甲、土屋久泰、仁贺保成人、茅原华山。
伪满日系官员	金井章次、松冈、中野高一。
伪满文化事业官员	杉村勇造。
图书馆官员	卫藤利夫、和田、柿沼介、岛田好、尾崎唯一、大塚、久米。
伪满教育官员	安藤基平、诸石熙一、岩间德也、伊藤伊人、崛越喜博。
神社人员	山内祀夫。
书贩	坂本胜、加藤。
文化机构	满铁图书馆、东方文化学院日本京都研究所、东亚考古学会、满铁奉天西站图书馆、东洋文库、满铁奉天西站中学、满洲学会。
政府机构	日本领事馆。

资料来源:此表为笔者据《静晤室日记》制成,时间为1931年12月—1936年4月。其中金毓黻在日本访问时所来往的日人和机构未列入。

金毓黻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可以稻叶君山为例。1932年7月11日,稻叶君山来访,两人一见如故。在治学路径上,“君言其师内藤湖南谓,研究辽东史实,宜先从朝鲜入手”。在史料上,稻叶谈到在朝鲜所见的渤海史料。<sup>④</sup> 其后两人多有观点与史料之交流。稻叶君山对与金之交往记忆深刻,“比者往来辽海之间,得识辽阳金君静庵毓黻,一日静庵出其所主编之东北丛刊数册,告余以中

①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10月30日,1933年5月26日,1933年9月17日,第2880、3060、3149页。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10月12日,第3164页。此五人依次为臧式毅、熙洽、袁金铠、吴恩培、孙其昌。  
 ③ 参见《侨满外人全国统计:九一八后遽增十倍》,《盛京时报》,1934年12月10日,第2版。  
 ④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7月11日,第2839页。

有汉译之发达史,乃杨君囊吾成能所译。其译语畅达,文笔流利,余甚喜之。但丛刊中废,斯役亦未得毕业,殊为可惜”。<sup>①</sup>日本汉学泰斗内藤湖南来访时金毓黻亦陪伴左右。内藤湖南赠以诗及碑刻拓本,诗中称赞金“静庵关左秀,为寄万秋情”。其间金毓黻与内藤多有交谈,金详细整理了内藤关于东北史研究、保存和出版方面的谈话要点。<sup>②</sup>

日本学者拜访金毓黻时多为访求史料,交流心得。金成为日本学者在伪满访学时必见的学者。“稻叶君山先生介绍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泷川博士来见,询以《永徽法经》一书有无传本,余告以未见”。<sup>③</sup>朝鲜京城大学赤松智城与秋叶隆“专究民风土俗之学”,“询余能至职萨满者之家一观其究竟否?”金乃引介并陪同观看萨满仪式两次。<sup>④</sup>金毓黻与来访学者在学术上较为投契。“岛田君绩于学,考览颇博,与余有针芥之契,园田君读书稽古,造诣孟晋,亦岛田君之流亚,此虽居异方域,言语睽隔,而可联为縞纻者也”。<sup>⑤</sup>金对日本学者的学术造诣亦颇为钦敬。“大抵东邦学者于东北地理多所阐发,剩义甚少,如近顷余考得之扶余城及通州城等地,虽为东土所未言及,亦不过一鳞一爪而已”。<sup>⑥</sup>

日本学者或机构还时常向金毓黻赠送或提供珍贵资料,令金备感快慰。金毓黻在《〈雪履寻碑录〉叙》中叙述了内藤湖南等中日学者在刊刻该书过程中的共同努力。<sup>⑦</sup>金毓黻还时常自满铁图书馆以及日本研究机构获得珍贵史料。“至满铁图书馆晤植野君,借《续日本纪》、《高丽史》各一册,此皆所谓生平未见书也”。<sup>⑧</sup>东方文化学院日本京都研究所寄赠金毓黻《唐三藏法师传》一函,该书“以高丽刊精本摄印,复校以诸家藏本,而撰考异,有功学术,殊非浅鲜。拜领之余,欢喜无量”。<sup>⑨</sup>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sup>⑩</sup>与满日文化协会组织的学术考察活动金毓黻亦时有参与。金对这种考察十分重视,他在考察渤海东京城前写道:“明白易晓者无过金石文字,苟有所得,皆史料也。”<sup>⑪</sup>因为“是地土匪极多,千里迢迢”。金毓黻首先随考古学会在长春、吉林之间与当局接洽考察事宜。<sup>⑫</sup>考察期间,金毓黻备尝辛苦。<sup>⑬</sup>1935年10月,金毓黻又随同满日文化协会往辑安考察好大王碑。<sup>⑭</sup>

伪满政权是在日本扶植下建立的傀儡政权,日本学者、官员等在伪满俨然“上宾”。与日“满”官员和学者的交往对外处境尴尬的金毓黻自然具有保护伞的作用。<sup>⑮</sup>金毓黻未必有“挟洋自重”的考虑,但客观上对其治学与日常活动是十分便利的。金1936年经由日本逃回到国统区即得益于日本

① 稻叶君山:《汉译满洲发达史序》,稻叶君山著,杨成能译:《满洲发达史》,萃文斋书店1941年版,第1页。杨成能字囊吾。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10月15日、16日、17日、18日、24日,第3164—3167、3170—3172页。

③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3月7日,第3003页。

④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9月8日,10月2日,第3144、3156—3157页。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11月8日,第3724页。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6月5日,第3593页。

⑦ 参见《〈雪履寻碑录〉叙》(1935年11月14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735—3736页。

⑧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5月16日,第2821页。

⑨ 《谢东方文化学院赠〈唐三藏法师传〉函》(1933年1月30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973页。

⑩ 该学会有明显的为日本政治服务的目的,参见严绍溥《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7—564页。

⑪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6月11日,第3080页。

⑫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5月22日、25日、26日、27日,第3058—3061页。

⑬ 《再致关路夫笈》(1933年6月19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3090—3091页。

⑭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10月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27日、28日,第3689—3706页。

⑮ 参见刘正《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年版。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滨田耕作、羽田亨等人在日本政学两界都很有影响,滨田与羽田等人并且与军界、政界关系密切。东京学派的池内宏、原田淑人、鸟山喜一、和田清等人或亦如是。

友人的帮助。“适值日本东京、京都两帝大教授服部宇之吉、池田(内)宏、羽田亨等过沈,余早与之相善,乃托其向日军部商洽,谓金某研究东方学术及东北文献,为吾等所敬佩,应准其赴日留学二年,以收联系之雅。竟借其力得以无阻”。<sup>①</sup> 金毓黻的儿媳于谨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当时沈阳领事馆中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历史有研究,了解静公的学术成就与为人,更同情他的遭遇”,“就不畏风险地为静公开了个出国考察的护照,静公才得成行”。“他那次逃走,无论到朝鲜,到日本,都有史学界人士去迎接,看望”。<sup>②</sup>

## 五、伪满时期金毓黻的日常生活

伪满初期,金毓黻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1932年5月,金与友人游北陵,“此为变后第一次郊游”。<sup>③</sup> 即使在其母寿诞时,金毓黻亦不敢知会亲友庆祝,场面略显冷清。这自然是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时会不定,不敢铺张,虽至友如允滋亦不敢明告,只在家中张宴,为困囿之乐,以悦老人耳目”。<sup>④</sup> 1933年初,金回顾道:余“尚知谨飭自守,且近一年来,绝少交游,不当政权,亦无开罪于人之事”。<sup>⑤</sup> 这可作为其事变后与外界接触的概括,其间的小心谨慎自不待言。因无公务牵累,金毓黻回乡省亲的次数亦有所增加。“倘半月不之见,必以为有他故,故仆乃频频归视,恐先母之念仆也”。<sup>⑥</sup>

但事实上金毓黻的生活环境已经渐次改善。一方面,金毓黻的日常酬酢逐渐增多,参加者多为旧友或日本友人,其中多为任职伪满者。1932年1月14日,“晚同允滋邀日人横山、森胁二君饮于明湖春,同座有曹克城、刘仲闻、于子廉、于洁泉四君作陪,又有阮叔周君已约定而忘催请”。<sup>⑦</sup> 横山、森胁为监视臧、金的日人,此类活动显然有助于缓解其处境。稍后金毓黻又加入了鸥波诗社。1932年7月3日,“与会者凡十五人,纫韞、黎雍、路夫诗皆先成,颇饶文酒之乐”。<sup>⑧</sup> 此后诗会每隔三五月举行一次。另一方面,金毓黻与关东军军官森纠的关系亦逐渐密切。“余前为制砚铭,今日又书条幅赠之。以余所睹,东邦军人应以此君为最,泽古自娱,独有神契,可谓投分之友”。<sup>⑨</sup>

但是金毓黻此时在行动上仍然不甚自由。金后来回忆道:“余以主一省教政,各校员生皆为余之党徒,故于余之行踪特为注意。”<sup>⑩</sup> 因不能自由出行,故他在搜求国内图书时只能通过邮购或求助友人。1932年12月3日,“向蟬隐庐购书,汇款十一元。又向同文书店购书,汇款七元”。<sup>⑪</sup> 1934年4月23日,金又写道:“托福克司先生由北平图书馆抄来《大元一统志》残本数卷,昨日携到,此真可喜之事也。”<sup>⑫</sup> 而国内学界的活动他也仅能听闻,而无法参与。1932年底,傅斯年、徐中舒等撰写的《东北史纲》即将刊行,金闻知后颇感遗憾,“余久蓄意撰《东北通典》,而竟不与此役,为之怅

① 《沈阳蒙难记》(1937年2月),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58页。

② 于谨:《关于金毓黻先生逃脱伪满的回忆》(手稿),1985年5月,全家珍藏,第3—4页。

③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5月29日,第2826页。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12月6日,第2913页。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1月16日,第2960页。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6月15日,第3344页。1934年5月,金母病逝,金悲痛万分。

⑦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1月14日,第2791页。其中曹克城、阮叔周即曹承宗、阮振铎,后为伪满官员。

⑧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7月3日,第2837页。

⑨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9月14日,第2863页。

⑩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1945年9月30日,第5930页。

⑪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12月3日,第2910页。两书店皆在上海。

⑫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4月23日,第3297页。

然”。<sup>①</sup> 时人甚至对金的隐居读书也有非议，“余喜亲书卷，时以笔札自遣，然此亦足以累人，非善于自处者也。且余所致力者，在考古一事，与今世绝不相蒙，而不知者乃以为别有用意。设如所云，真所谓进退失据”。<sup>②</sup> 他有时亦会对读书生出厌倦之感。“愈衍愈繁，层出不穷，终日伏案，茫无端绪。然舍此别无自遣之方”。<sup>③</sup>

尽管如此，金毓黻仍谨守气节，不与时人同流合污。1933年5月8日，“今日有人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此真不知余为何如人者”。“弃世逃名，居夷浮海。世既无可与语，故宁出此途而不顾也”。<sup>④</sup> 1933年7月10日，“座有生客，多谈不入耳之言，又热不可耐，勉强终席”。<sup>⑤</sup> 这些似劝金出仕或为伪满歌功颂德者，显然与金的想法格格不入。甚至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金毓黻也宁肯穷困，而不作他想。“向日俱作冷官，恃节俭以维生计，刻虽收项令（疑‘令’为‘合’之误——整理者注）无，决不因此稍萌畏穷之念，亦决不向人呼穷”。<sup>⑥</sup> 而此时金毓黻的友人多有迫于生计出任伪官者。黄黎雍出仕时，金感慨道：“风尘奔走，室家为累，舍此别无谋生之术”。<sup>⑦</sup> 杨显青在寄给金的诗中亦表达了其出仕的无奈：“生计云何移素志，仕途仍不免清贫。”<sup>⑧</sup>

在精神压抑、生计渐窘的情势下，金毓黻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治学上。他满含使命感地写道：“我辈似受苍苍者所诏示，若负大任于厥躬”。“如旧籍之刊行，古迹之搜求，皆有非我莫属之势”。<sup>⑨</sup> 金毓黻的治学成绩亦颇为显著，其代表作《渤海国志长编》与《辽海丛书》皆刊刻于是时。《渤海国志长编》出版后深得时人赞誉，金梁自天津来函称：“《渤海长编》广搜博证，前无古人，此处学者共惊绝作，英友庄君万里电购，吾鲁之光，弟亦有与荣施焉。”<sup>⑩</sup> 日本学者外山军治略嫌苛刻地评论道：“这本书的特点与其说是论说，莫如在于作为史料集这点上。作为史料集，本编近乎完美。添了非常便利的书。”<sup>⑪</sup>

1933年下半年以后，在金毓黻的隐居治学及其学术圈的影响下，日“满”各界逐渐认同了他的学人身份。1933年12月23日，金“诣西站图书馆讲演《东丹王陵考察记》，倩文君蔚芝作翻译”。<sup>⑫</sup> 1935年12月25日，“朝鲜都督宇垣氏新印《诗次故》一帙，介稻叶君山先生见贻”。<sup>⑬</sup> 日“满”官员学者对金的治学能力亦评价颇高。岛田好认为“金氏见识过人（至少在满洲），是非常有前途的学者”。“满洲国首相郑孝胥把金毓黻誉为满洲国第一学者，在进行新研究的学者很少的满洲国，是除罗振玉和上述的吴廷燮等大家之外，作为这方面研究的学者的第一人”。<sup>⑭</sup> 外山军治亦指出：金“作为满洲国首屈一指的学者，现在是名气很高的人。”<sup>⑮</sup>

①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12月13日，第2916页。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2年12月18日，第2921页。

③ 《致景武平吉林笈》（1933年1月11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957页。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5月8日，第3050页。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7月10日，第3101页。

⑥ 《致郭振声笈》（1935年4月27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569页。

⑦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10月31日，第3717页。生计是一般行政人员参与伪政权的重要原因，这在汪伪政权的江苏亦存在。参见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22页。

⑧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12月31日，第3761页。

⑨ 《致闾霍初笈》（1934年3月9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261页。

⑩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9月18日，第3422页。

⑪ 外山军治：《评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史林》第19卷第4期，1934年），梁启政、张韬主编：《金毓黻研究文集》，第340页。

⑫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12月23日，第3214页。

⑬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2月25日，第3531页。

⑭ 岛田好：《评〈渤海国志长编〉》（《书香》第62期，1934年），梁启政、张韬主编：《金毓黻研究文集》，第335、337页。

⑮ 外山军治：《评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史林》第19卷第4期，1934年），梁启政、张韬主编：《金毓黻研究文集》，第338页。

随着学人身份的树立,金毓黻的处境改善很多,其日常生活亦渐趋闲适。1933年4月,“朝间,至万泉河散步。自前日始,日为常课”。<sup>①</sup>至1935年3月,“每日朝起散步于小河沿,晚餐后复为击球之戏,体魄渐强,精神日畅”。<sup>②</sup>而金毓黻的外出游览亦逐渐增多。1934年5月,金毓黻携妻儿往东陵游园。“日来天气晴朗,群花都放,时属夏初,而春光灿烂如江南之二月焉”。<sup>③</sup>1935年8月,金毓黻在熊岳浴于温泉,“仰卧汤中,如寝蓐火之土床,初觉蒸热,久则快美,白云行空,与碧天相映”。<sup>④</sup>明丽的文字中间流露了金此时的愉悦心情。

但愉悦仅是一时的,伪满政权下隐居读书的苦闷则时时存在。在隐居中,金毓黻对旧友尤为珍惜。阍阨逝世时,金哀叹道:“从此余少一知友、一可谈之人。人琴之痛,其何能已!”“知交寥落,其何以堪,伤哉,伤哉!”<sup>⑤</sup>旧友的凋零或出仕更加深了金毓黻的孤寂落寞之感。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孤独的心境:“念自蛰居沈水,罕与人通,允滋墓有宿草,霍初归骨故乡,武平则匿迹新都,足下亦远睽异地,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正谓仆之今日。”<sup>⑥</sup>

## 六、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困顿东北的中国官员面临着民族大义与现实局势的抉择问题。逃亡关内、投军抗日和出任伪官是他们可做的几种选择。多数东北官员并非甘心做汉奸,最初不过是意图维持局面,后来却愈陷愈深。<sup>⑦</sup>伪满时期,金毓黻确有担任伪职和参与政治之情事,但其中既有“跑龙套”的被迫,又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金毓黻的打算是“宁受困辱,以俟时机之至”。<sup>⑧</sup>时在伪满的好友金景芳解说道:“先生是以老母在堂,采取辞尊居卑,伺机逃走的对策。”<sup>⑨</sup>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亦指出:“静老隐忍就辽宁省图书馆长职,以金已在范不能委之而去,用心良苦,后人应厚谅之。”<sup>⑩</sup>在金毓黻1936年逃回国统区时,国民政府及其友人黄炎培、傅斯年等皆以欢迎态度待之,至抗战后期和战后方出现诋毁和质疑的声音<sup>⑪</sup>,但即便以战后国民政府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核定,金亦无有犯科者。<sup>⑫</sup>

在奉系和张学良时期,“学人入仕”的金毓黻已发展了自己的政界人脉和学术圈。九一八事变前,金毓黻的“官员”身份要多于学人角色。在从政界向学术界转变过程中,金毓黻的“官员”身份

①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3年4月4日,第3024页。

②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3月15日,第3541页。

③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5月13日,第3319页。

④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8月25日,第3634页。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4年3月15日,第3267页。

⑥ 《致赵任羹笈》(1935年7月19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624页。

⑦ 参见《张景惠笔供》(1954年6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第44—45页;张振鹭:《九一八事变时的臧式毅》,《传记文学》第12卷第4期,第38页;袁庆清:《袁金铨的一生》,孙邦主编:《伪满人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463页。

⑧ 《沈阳蒙难记》(1937年2月),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第2660页。车彗虹将伪满基层官吏分为“甘当亡国奴”“醉生梦死”“任职谋生”和“有抗日思想”四种类型,但未深入展开。参见车彗虹《伪满基层政权研究》,第214、222—225页。按照车的划分,金毓黻的友人应以后三者居多,而金大致可划入“有抗日思想”之列。

⑨ 金景芳:《金毓黻传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第72页。

⑩ 罗继祖:《堙户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⑪ 参见张皖唯《金毓黻日记所见民国学林遗事》,《书屋》2010年第2期。

⑫ 尽管金毓黻曾在伪满文化机关任职,却并无“凭藉敌伪势力、侵害他人”之行为,所谓“参事官”等职,亦与条例规定之“简任、荐任、特任”取位以及“为敌伪宣传”相去甚远。参见《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5年11月23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0页。

逐渐褪去,而学人身份逐步树立。金毓黻虽然从参事官蜕化为图书馆馆长,但他官微势大,金旧有的人脉及其与日“满”人士的交往形成其新的政界人脉和学术圈。从“学人入仕”到隐居治学,金毓黻的“权势”由实变虚,学术圈则由小变大。<sup>①</sup>这体现了金毓黻从“学人入仕”到回归学人的身份转型。这期间金毓黻在日“满”政学两界的人脉成为其居停的保护伞。这种关系网既改善了他隐居不仕的尴尬处境,又便利了其学术活动的进行,从而有助于其学人身份的树立。虽然不免受人诟病,但他掌握了其间的分寸,实现了保身、治学与脱困的目的。

伪满时期,官员们的日常生活大体延续了旧时的内容。他们在读书稽古、婚丧嫁娶和私人酬酢中仍能体味往时的自由与愉悦。日“满”文人的交往亦有着旧时中日文人间往来的影子。不过这些只是伪满政治傀儡戏中的插曲而已。伪满政治在官员们的日常生活中亦有所投射,伪满官吏对读书稽古等活动的热衷一定程度上亦折射了他们在傀儡政治中的失意。罗振玉在监察院的办公只是“署纸尾”,“平日还是忙他的著作。这四年中,著书和印书成果都不少”。<sup>②</sup>袁金铠任尚书府大臣时,除了国务院事务官“每天送用宝和上奏文件来一次以外,经常是静悄悄的”。<sup>③</sup>

伪满时期金毓黻的保身与脱困得益于其“隐居治学”的应对之道。金本为学人,事变后又着意远离官场而树立学人身份。这源自中国文人“隐居不仕”的传统和本能。<sup>④</sup>金毓黻曾在诗中表达过这种心曲:“君子待时而藏器,阜帽辽东同避地。”<sup>⑤</sup>在1936年返回国内后,金毓黻虽曾一度“入仕”安徽省政府,但此时他已对官场生活感到很不适应。<sup>⑥</sup>其后金毓黻主要过着教书、治学的学人生活,而他呈现给时人以及后人的亦主要是其“学人”的一面,尽管其与政界人士仍有着些许联系。

[作者王春林,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sup>①</sup> 章清曾提出知识分子(学人)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是通过“权势网络”实现的,并谈及其间知识分子的“依附性”。章所探讨的《独立评论》群体多为纯学人,其“权势”主要是虚的“关系网络”。金毓黻的“学人入仕”与回归学人提供了一个反例,当学人在政学两界游走时,他的“权势网络”与“学术网络”伴随其身份的转变会发生明显的消长,甚至质变。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sup>②</sup> 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121、126页。

<sup>③</sup> 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sup>④</sup> 参见蒋星煜编《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高敏:《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胡毅鹏:《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sup>⑤</sup>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1935年8月8日,第3630页。

<sup>⑥</sup>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册,1937年5月10日、14日、21日、25日,6月1日、4日,9月17日,11月20日,1938年4月26日,第4012—4015、4026、4041、4139页。